



2

1982

南开史学

NANKAI SHIXUE

南开史学
(1980年创刊)
1982 年第 2 期
(总第 6 期)
1982年 月出版

主办：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
委员会

编辑《南开史学》编委会

目 录

旅欧共产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王永祥	1
论亚非史上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张 象	15

王鸣盛学术述评	来新夏	39
地理环境与明代女真族社会经济的特点	王文郁	62
试论清中期的“夷欠”问题	林延清	94

真假义和团探析	陈振江 李喜所	123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 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魏宏运	141
试论“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政治思想	杨劲桦	161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		

.....	高德福 183
试论“一二一”运动的历史地位	
.....	陈志远 196

试论岩仓使节团与日本近代化	
.....	杨栋梁 207
元国信使一山一宁东渡述略	
.....	毛德传 227
关于明刻《日本考》	
.....	管 宁 233

新文化运动的新方向	
.....	魏宏运 241
读史札记（两则）	
.....	张国刚 245

资料选译

关于中国劳工状况的文件（续）	
.....	肖传经 黄桢寿 贺乃斌 译 251

旅欧共产主义者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王永祥

经过“五四”风暴的洗礼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开始在中国形成。但一些同志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这一重大问题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内共产主义者的作用，而对旅欧共产主义者的贡献，却很少述及。这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五四运动的优秀领导者和骨干分子，在运动后不久，即前往欧洲从事革命活动，这是一支人数很多、质量很高的革命队伍。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王若飞、刘伯坚，以及朱德、陈毅、李富春、邓小平、聂荣臻、蔡畅等同志。这个时期，他们虽然没能参与国内工作，但也顺应时代潮流，在欧洲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非常可贵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的不少作法和见解，是很有独到之处并可称为典范的。这些，构成了中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重要内容，应该予以重视。本文拟就此略作补充并发表一点粗浅看法，敬请指正。

旅欧党团组织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相继成立后，

就在内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格训练。这一工作，有领导、有组织、有方法、有步骤地开展，并迅速取得了卓越成效。旅欧共产主义者称此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而中心口号是“学共产主义”。①这种学习和训练是在自觉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最精深的科学，不是容易懂得的。我们既命名为共产主义者，便应当将这种主义的根本观念弄清楚，方略弄明瞭，制度弄熟悉，……然后才能固定他的思想，保持他的行动，虽经万苦千辛，不致中途变节”。②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成为坚定而明智的革命战士。

在组织上，旅欧共产主义者成立了名为“共产主义研究会”的机构，专门负责有关学习事宜，在党团员比较集中的地区，成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分会，分会之下，划分若干学习小组。共产主义研究会出版有《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用以登载大家学习中的有关通讯，包括学习书目、辅导文章、个人心得体会、不同意见相互质询、答疑，还介绍学习方法。

在“学共产主义”的总题目下，他们把学习内容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共产主义的学理”，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二）“共产主义的方略”，如劳动运动，统一战线，政治斗争，军事行动；（三）“共产主义的制度”，主要是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的现行法律，政策和各项设施。使用的基本教材，是原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作介绍及生平事迹，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传》、《列宁传》，也有《俄国革命

纪实》等小册子。旅欧共产主义者还自编学习材料，名为《共产主义教程》。该教程依据马克思学说科学体系，将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用通俗语言，按专题加以阐述。如《共产主义教程》第四号是专门讲述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作者分别从阶级斗争的“由来”、“意义”、“情势”、“历史”和“阶级斗争的解决”五个方面进行了阐发。教程第五号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共分为四章：（一）“流通行程：商品、货币、资本、劳力；”（二）“生产行程：剩余价值”；（三）“分配行程：工钱、积蓄、原始积蓄；”（四）“发展行程：经济趋势，历史发展”。③自然，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每号《教程》都有三、四十页，四、五万字，不仅编写它要花费很大心血，刻写、印刷也遇到不少困难。在紧张的勤工俭学生活之余，在艰难的自食其力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为编印每一号《教程》所付出的心血是可以想见的。现在保存下来的几期《教程》，已成为旅欧共产主义者热烈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见证。

学习的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当时，旅欧共产主义者有的居留法国，有的则住在德国或者比利时。为适应这种居地分散的客观情况，他们采取多种方式，既提倡每个人自觉努力学习，也很注意发挥集体作用，互帮互学，共同前进。他们让水平高的与基础差的同志形成固定联系，彼此经常通信，交流体会。如熊锐④要求他负责指导的五位同志：“在信内告诉我你们各人看过及现在正看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名子并作者，对于我发挥的议论毫不放松的痛下批评；嗣后请你们各人常来信讨论，至少每两周一次”。⑤指导者对被指导者要

求既严格,而态度又谦虚、诚恳。小组讨论会是一种小型集体学习方式,由在同一工厂、学校或相邻近同志随时召集举行。小组讨论时,往往先由“各人报告读书心得”,然后共同“讨论问题”,最后由负责人(小组书记)对各种意见进行归纳,总结。在《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上,常刊登各地小组讨论会的“报告节略”。旅欧党团组织为提高学习效果,培训骨干,还用组织科学讨论会的方法对旅欧共产主义者进行集中训练。这种称为“社会科学讨论会”的集训,由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从各地抽调学习积极分子分批到巴黎轮训,每期几十人,时间一周左右,主要内容是开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讲座,由负责同志或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担任主讲。经过集训,既能使骨干分子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也便于领导机关了解和掌握各地同志在学习中遇到的共同性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予以解答、帮助,提高学习质量,作好思想工作。

旅欧共产主义者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学习,他们知难而进,依靠顽强的革命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下去,并且对此引以为荣。他们不仅自身学好革命理论,还努力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周围群众。他们说:“宣传主义,吸收同志,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既是信仰共产主义者,就要时时刻刻不忘宣传,有机会宣传便要宣传,不要存一点顾忌流俗人的笑骂”。^⑥这种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时时处处为“主义”而宣传、奔走的共产主义者作风,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努力继承和发扬的吗!

把书本学习与在实际中向周围群众学习密切结合起来,这是旅欧共产主义者经常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同志

无论在工厂学校，都应当参加所在国与我们有关系的工人和少年团体的会议去受训练……学习一切群众的活动能力，而且与他们实地去接近。因为共产主义不是空口谈的东西，是要实地去应用的，这种实地应用的方略，不是死死地能在书本上得到，是要亲自去到群众中去领会的”，“必如是接触，我们才可以真正明瞭欧洲各国劳动运动的情形，及交换彼此间的意见与新闻。这也是我们旅欧同志应有的义务。”^⑦据此，旅欧共产主义者实际参加了所在国工人反抗资本家压迫的罢工等斗争，一些同志还与所在国的共产党、共青团保持密切联系，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学到不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

随着经验的不断丰富，旅欧共产主义者“学共产主义”的各项制度和要求日臻完善。他们把进行这一工作的原则、步骤、内容和方法，以明确的文字概括成具体条文，作为“通告”下达各级组织和成员，令其严格执行。“通告”中指出：“训练的原则是：甲、努力研究共产主义和实际问题；乙、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以便从早归国，奔上革命战线。”在“研究的步骤”中，要求在理论上重点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辩证法，经济学，阶级斗争，政治原理，无产阶级专政，民族解放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在“研究的材料中”，指定了一大批中文和法文书刊。在“训练的方法”中，强调支部定期举行“讨论会和批评会”，“除支部会议外”，至少“每月应举行批评会一次，讨论会两次”，“讨论的内容，第一次为共产主义，第二次为实际问题，第三次为读者报告，以后准此类推”，并要求“各同志应随时练习当主席作记录，以养成

谈话应付作文诸才能，又应常常参加公开会议或加入国际间活动，以便学得讲演、煽动、计划……种种活动能力”。⑧

这种学习制度，旅欧共产主义者从一九二二年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六年底，即到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独立活动基本停止为止。在“学共产主义”的口号下，旅欧共产主义者经过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提高了觉悟，指导了行动，迅速成长为坚定自觉的优秀革命战士。

二

在抓紧内部训练的同时，旅欧共产主义者还以很大力量进行“对外宣传主义”，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影响广大旅欧华人，特别是成千上万名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他们先后创办发行的机关刊物《少年》、《赤光》，以及他们影响下的《工人旬报》等报刊，承担了这一光荣使命。这些宣传的影响，大大超出旅欧华人的范围。以《少年》为例，它当时远销至国内乃至旅美侨胞中，上海新青年社和加拿大的华人工会都设有《少年》的代售处。一个地方性的刻写油印刊物，能在中国社会引起如此重视和反响，足见其在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旅欧共产主义者的内部训练以严格、有方、持之以恒为特点，那么，在“对外宣传”中，他们则以深刻、敏锐、富于战斗力而见称。

“传播共产主义学理”，⑨是旅欧共产主义者“对外宣传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在他们发行的刊物上，采用了三种形式进行这一工作。其一是，在封面或显著位置选登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和著名论断，如在《少年》第九

号、第十号封面上分别选登了《共产党宣言》和《论权威》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名言；其二是，刊登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译文（外译中），如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系《法兰西内战》中的一部分），列宁的《共青团的任务》（旅欧共产主义者译为《告少年》，在《少年》第一、二、三号上连载）等，都是在我国首次发表的中译文；其三是，从法、德文字的报刊上选译解释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如从法共《人道报》翻译《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等文章，概括介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生平及其学说的重要内容与观点。由此可见，《少年》等刊物已成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旅欧共产主义者没有停留在对马克思学说的单纯介绍或宣传上，而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我党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对指导现实斗争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这是在战胜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丰硕思想成果。

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更加激起旅欧华人中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仇视。他们声称：“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攻击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迷信”；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此时正在法国留学）竟诬蔑共产党人“把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当作圣经”，“把首领当作牧师，一味盲从，不讲理性”。⑩阐明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态度，成为关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问题。旅欧共产主义者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⑪等文章中，申明了如下观点：马克思学说是从实际出发，“一本科学的精神”而建立起来的，与宗教思想毫无相关；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是信仰而不是迷信，“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

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因此他们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非议”。^⑫这反映出旅欧共产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理论上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应该信仰，是因为它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经得起“在‘实际’上来‘试验’”。这里已经包含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的基本内容。这样的观点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仅一年之后——即已如此鲜明地提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旅欧共产主义者也很早就明确提出来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工农阶级进行了精辟分析，指出：工人“人数虽不十分占多数，他们的力量是最容易集中的，是可以直接与有产阶级交锋的，所以他们是共产革命的先锋队”；对农民，我党必须“团结农工佃户贫农三个阶级去抗制”地主阶级，“组织农民——与俄国虚无党的走入民间不相同——也是中国共产革命间的重要工作，万万不能忽视。组织农人的方法，我以为要从农会与农民教育入手。农会是无产农民的保护机关与团结的基础，可以用它做政治的争斗，可以用它来抵抗地主的剥削与官厅的压迫，只要同志们肯亲身到乡下去，一定是有效果的”。旅欧共产主义者还指出：“我们最后目的是要做到工会农会联成一气。如此则革命根基方建筑得稳固，而革命后的各地方苏维埃，一举平间就可以组成”。^⑬这里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人、农民，依靠工农两大革命主力联盟的思想，明确了我党基本力量之所在，明确了我党在民主革命中工作的中

心和重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党作为一个战士，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掌握两件法宝。一是武装斗争，一是统一战线。建党之初，在中国共产主义者中，能明确认识这一真理的，可说是为数甚少。早在一九二二年，在批判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提出的“好人政府”改良主义主张时，旅欧共产主义者即已明确提出关于建立革命军的思想。他们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⑭并进一步指出，此外，还要组织和发展群众性的“暴动”，使之、成为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训练而能经久的革命行动”，^⑮二者的结合，就可以使“民族独立伟业”获得强有力的支柱。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旅欧共产主义者号召：“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站在“国民大团结旗帜之下”。^⑯在这些文字中，旅欧共产主义者以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列强和军阀）的态度为准绳，明确规定了团结对象的条件和范围，既强调了“大同”，又允许存在“小异”，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把极为广泛的革命力量组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当时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函义非常恰当而又十分精辟的表述。这无疑显示出旅欧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

正确理解和处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关系，是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主义者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旅欧华人中，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大肆鼓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国

家主义”，实则贩卖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旅欧共产主义者向之痛下攻击。周恩来明确揭示了世界上两大敌对营垒的尖锐对立，指出：“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压迫阶级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不过是他们的爪牙；至被压迫阶级，则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是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在这种情势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民主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争斗，以便打倒国内资业本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他以国际的资本进攻被压迫阶级而不分国界的一样”。^{①⑦}李富春驳斥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谬论，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的是“共同侵略”，中国人民的斗争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这个重要因素则不能胜利，而“外国人之赞助我们的，全是国际主义者，即工人和共产党人，那一般讲国家主义的政党和其报纸，都象青年党人一样，专于利己损人”，“不为中国人民说话”。^{①⑧}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他们说：“我们要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方面。”^{①⑨}这就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必然联系上，阐明了爱国主义必须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道理，深刻地批判了反动的民族利己主义。

旅欧共产主义者阐述的上述思想，是他们对中國革命提

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这些观点，对于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指导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共产主义者当时曾密切关注他们的理论宣传工作，并予以很高评价，我党著名理论家、宣传家肖楚女同志撰文评论说：此刊（《赤光》）“言论颇犀利而允当，指示读者正轨不少”，深居国内之人，“得此则眼光如炬矣”。^{②0}

三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旅欧共产主义者能够取得上述成就，首先在于他们把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来对待，始终把“学共产主义”，用马克思学说武装头脑作为思想建设的最主要内容。这对于他们的成长具有很大影响，是构成旅欧共产主义者杰出素质的重要方面。因为，二十年代初叶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理论准备不够”的弱点，“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②1}形成这一弱点的原因在于：党成立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不久，数量也很少，不如欧洲那样已有近百年的传布历史；用欧洲文字写成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部尚未译成中文，而国内同志能阅读外文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为数不多；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卷入了革命群众运动洪流，客观形势要求他们将主要力量用于从事实际革命活动，无暇进行长期的理论研究。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同志，在理论准备上，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方法的了解上，显得甚为欠缺。而旅欧共产主义者则处于大不相同的境况。他们身处欧洲，不但马克

思主义的著作很容易看到，而且他们大多能用英文、法文或者德文直接阅读原著；旅欧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现实斗争任务，相对说来，也不如国内那样迫在眉睫。因此他们得到了远较国内同志优越得多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加上主观的自觉努力，就使旅欧共产主义者在系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完整体系和基本原理上，在结合各国情况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上，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迅速取得长足进步。这不仅使他们成长为具有较高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为锻炼成优秀的实际革命活动家，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是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旅欧共产主义者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密切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革命实践之“的”。对旅欧党团组织相互关系的正确处理，很能表明旅欧共产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历史的原因，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当时都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课题。国际上，一些国家青年团政治上独立的传统影响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由于只一般地确定团接受党“政治上的指导”而没有同时确定组织者上领导与被领导，使“政治上的指导”很难落实，不利于共产主义组织的团结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旅欧共产主义共深刻考察了这一普遍现象，认为必须“明定条文，以去此弊”，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并率先实行。其办法就是在组织上确立党对团的领导体制——由同级党组织“选派青年党员二人”为团组织的负责人，“我们为欲使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明

白地表现其从属和密切的关系起见，必须采用此法”。^{②②}这样从组织上确定了党对团的领导地位，也就保障了党团之间政治、组织上的一致性，从此把青年团的活动完全纳入到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范畴，这对促进“共产革命”的发展，无疑是很大贡献。

其三，在于旅欧共产主义者所处国际环境的陶冶和影响。他们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国土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就比较确切，比较全面，不容易产生片面性和“走形”的问题（而这一点，正是在国内的同志很难完全避免的）。他们接触和经历了作为世界革命高潮重要部分的欧洲工人运动，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洪流之中，不仅有中国的而且有世界的革命经验、教训可以引为鉴戒；他们得以及时了解东方中国，西方“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三种不同国度、不同革命方式和政策，并相互进行比较、推求和鉴别；因此，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革命。正如周恩来同志当时曾经指出过的：“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②③}完全可以这样说：旅欧共产主义者是放开眼界看世界、用世界革命的眼光审视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共产党人。

注 ①伍豪《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一号》。

②《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第46页。